

书子
系珍

两晋文士的
人生趣味与
文学世界

黎臻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两晋文士的 人生趣味与 文学世界

黎臻 著

本书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成果
项目编号：106112015CJDX070003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晋文士的人生趣味与文学世界 / 黎臻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36-8408-2

I. ①两… II. ①黎…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晋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5457号

两晋文士的人生趣味与文学世界

LIANGJIN WENSHI DE RENSHENG QUWEI YU WENXUE SHIJIE

出 版 人: 郑 可

质量总监: 张丹飞

策划编辑: 王竞芬

责任编辑: 王竞芬

装帧设计: 张鑫坤

责任印制: 何惠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 (0551) 63683012, 63683013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袁济喜

在中国文化中,“趣味”是一个重要的范畴。从两晋文士的人生趣味与文学世界这一层面去求索中国文化之特征,是极有意义与价值的,而目前对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就此而言,黎臻这本书可以说是先导性的成果。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世俗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建在宗教性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虽然在东汉晚期之后佛教东来,宗教学说一度兴盛,但并未能取代儒道玄互融的局面。中国世俗文化的特点便是对于世俗生活的认同与欣赏,对于人的七情六欲,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生成的趣味,是持既肯定又超越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肯定人的世俗生活乐趣的同时,又主张对于这种生活趣味的超越,三国时魏国玄学家王弼与何晏论辩圣人有无情性时,就主张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有情而不累于情。中国古代的哲人与文士,都是富有审美情趣的人物,他们将人生理想与道德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趣味与艺术实践之中,他们的文学艺术世界也是这种人生趣味的转化。这种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文艺精神传统的可贵因素。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引入了西方美学理论并结合中国人的人生、艺术等方面,提出了趣味主义:“假如有人问

我：‘你信仰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①也可以说是他发现了这种文化传统并加以阐扬。

而这种文化精神与文化特质的体现，莫过于魏晋时代的人生趣味与文艺生活了。随着汉代儒学的转化、老庄与玄学的兴起，士族名流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他们对两汉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进行了变革，从经明行修的人生道路变为在经国立业之余，嗜好诗酒，纵情山水，风流相尚，沉溺清谈。动荡年代的人生无常与时不待我的忧伤，又使他们对于生命的认同有着特殊的感受，从而激发了内在的生命意志，而作为这种生命精神的彰显，便是趣味范畴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张，迸发出强烈的火花，投射于丰富多彩的文艺世界。士人活动与士人精神通过日常生活方式与名士风度，凝聚成《世说新语》这样的名士风流宝鉴，塑造了嵇康、阮籍与陶渊明这样的名士，高铸成竹林七贤、金谷诗会、兰亭雅集等名士群落，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魏晋风度，嵇康、陶渊明成为后世的偶像，催生了苏东坡这样的大人物的诞生。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两晋时期《兰亭集序》中揭櫫了晋人的生活趣味与文学精神的统一，《世说新语》记载士人的趣味与文学轶事。趣味在魏晋时代是联结士人生命意识与生活方式的中介，其中的名士生活趣味与文艺哲思也体现了中古时代人生与文艺的统一。”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魏晋文化的书籍并非没有，但是从人生趣味与文学世界的角度去探索却还没有，黎臻博士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对这方面的补罅。

此书值得肯定的地方，便是选题的精准。趣味虽说古已有之。趣味的发现与焕发出生命力，确是在魏晋时代人的觉醒基础之上。自东汉晚期以

① 梁启超，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7—18。

按：为避免重复，本书所引文献，相同的参考文献首次出版时标注版本全信息，再次出现时，只标注书名、出版年和页码。

来,士人生命意识的重新觉悟,以及经学价值观念的转变,都使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在于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回归自我与回归人性是当时文艺的主旋律,《古诗十九首》以及汉末乐府的人生趣味的重新演绎,便是有力的证明。士人阶层将人生趣味视为风流所尚,从大儒马融到汉末游士,都在吟咏人生苦短,时光飘忽。而这种生命意识投注于生活趣味的再造,诗酒风流、山水品赏、玄学清谈,便是这种趣味的写照。而文学与艺术直接融入人生趣味,反映在文艺观念上,便是文以气为主,吟咏情性观念的流行,从建安七子到正始名士,关于这种趣味的写照便形成新文体与新思想,各种各样的文人聚会、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的活跃,成为魏晋风度的风景线。而当时趣味的特点之一,便是不同凡响、不合时流、特立独行,往往形成“痴”“诞”等范畴与术语。《晋书·嵇康传》称嵇康为“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便是这种现状的写照。本书从人生趣味切入两晋文学世界,切中肯綮,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虽然从现在的学科角度来说,一则属于哲学,一则属于文学,但读后感到顺理成章,圆融透彻,这也可见,从魏晋文化固有的内在理路去梳理和研究,较诸外在的分析,更得其中三昧。

本书作者的学术功力还表现在对于哲学与文学的通贯考察上。魏晋人生趣味与文学世界的风采,得益于当时的精神哲学的高蹈。真正的魏晋名士,往往具有很深的哲学修养与文艺修养,二者在人生层面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一致。在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会兰亭集会中,文士们作有多首兰亭诗,从其中可以窥见东晋文士的自然之趣。自然之趣味,首先在于“养神”。东晋士人对于自然山水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在于自然能够弥补士人的精神空虚,达到个人理想人格的实现与超脱。因此,放弃对于这一层面的分析,无助于对魏晋文学与文化的深度分析。本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两晋时代人生趣味与哲学建构》,从王弼、何晏与阮籍、嵇康与郭象玄学对于人生趣味的形而上之浸润,《列子》中人生趣味的享乐化,还从佛学对东晋文士人生趣味的影响,

谈到了魏晋名士人生趣味的形而上之思想境界。这些都有相当的难度,但是作者却相当准确地说出了其中基本的路径,也因此使后面的文学世界的论述更富有说服力。

当然,趣味与风格等范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不经意与偶然的方式,彰显出最深层、最内在的人格精神,往往通过小品式的情节演绎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人格境界之层面。这就是趣味最核心、最有魅力之所在。《世说新语》之所以又被称为笔记小品,就在于它这方面的成功。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创新的观点。本书大胆地将死亡趣味化作为两晋人生趣味与文学世界的重要内容来论述,是卓有识见的。书中记载,东晋时期,士人酷嗜挽歌,以至于有在生活中演唱挽歌、欣赏挽歌的怪诞趣味。《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当时一些名士在日常生活当中欣赏挽歌,实际上是将生与死视为同一,等量齐观。同时又努力泯灭生死的界限,在生中感受死亡,于死亡中找寻生的乐趣。文士生前有特殊人生趣味的,在吊丧之时,有好友知己为之,以示追忆、哀痛之情。如顾荣生时好琴,他去世以后,家人将琴放置在其灵床之上。与顾荣同为吴人的名士张翰前去吊丧,哀恸不能自己,径直上灵床鼓琴数曲。张翰鼓琴,是以顾荣生时的趣味来吊念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灵魂的欣赏与共鸣。此类带有怪诞不羁、特立独行的趣味,影响到陆机与陶渊明的《挽歌诗》的产生,陆机与陶渊明生前就给自己写挽歌,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诗格,这只能说与当时的任诞之风即荒诞之审美趣味相关。本书中对于这些特殊的行为方式与人生趣味之审视与开掘,显示了作者敏锐的人文学术视野。从人生趣味去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世界,特别是内在的文学精神,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本书对于魏晋时代文士的人生趣味与文学世界的研究,可谓一个典型。

本书还展现出作者良好的从事人文学术的功底。作者既对于文献有着

很好的择善而从、要言不烦的能力，又有着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对于两晋文士的人生趣味的梳理与定位是一件十分烦难的事情，既要找出相关的资料，又要避免汗漫无际的定位，更要对涉及的问题深入分析。由于这方面目前没有现成的参考资料，只能从原始材料与相关成果中去爬梳，作者收集与梳理出相关脉络，同时加以理论分析，特别是最后将陶渊明作为两晋文士人生趣味与文学世界的典型来分析，是很有价值与功力的。这些都显示出作者有着很好的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潜质，相信她经过不懈的努力，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2016年3月3日于北京南郊大兴寓所

目 录

前 言	001
一、趣味与人生趣味	002
二、研究思路	008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与人生趣味	011
一、“趣”“味”字义辨析	012
二、魏晋南北朝文艺批评中的“趣味”	022
三、汉魏以来人生自觉与两晋文士人生趣味的形成	026
四、两晋时代人生趣味与哲学建构	036
第二章 两晋文士人生趣味与文学之总观	063
一、人生志趣的选择——两晋文士对仕与隐的选择及诗文创作	063
	001

二、风流情趣——两晋文士的生活癖好及诗文创作	089
三、自然之趣——两晋文士的宇宙自然观与诗文创作	102
第三章 两晋文士的人生趣味与文学之专题探析	121
一、两晋文士的人生趣味与文体自觉	121
二、西晋文士的儒学趣味与文学创作	141
三、从金谷诗会和兰亭诗会看两晋文士的人生趣味与诗歌精神	183
四、两晋文士的死亡趣味化	208
五、《世说新语》对士人趣味的接受与传播	232
第四章 陶渊明人生趣味与文学精神的高度统一	241
一、陶渊明的劳作趣味——为物质的愉悦	242
二、陶渊明的读书趣味	246
结 语	270
主要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287

前 言

两晋的文学是士人的文学，由西晋初年的傅玄、张华等人传承魏风，兴起晋调；潘岳、陆机开启太康之盛，又郭璞、孙绰袭清谈之风，而陶渊明结东晋之局，成为一代风雅之冠冕。两晋的文士，或为博史通经、文才出众的寒衣之士，或为高冠轩冕、闲畅清通的高门士族，都是两晋文学独特风貌的缔造者。两晋时期的士人，大都为文学之士，本书所谈文士，也主要是以“文学之士”为主，但同时也牵涉“玄学之士”或特有魏晋风流的“名士”，因此并不以纯粹文学为局限。研究两晋士人与文学是中古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研究的热门。其中在作家人格、士人心态、士族身份等各方面的研究较多，同时，以魏晋著名哲学思潮——玄学为背景研究两晋文学的也如恒河沙数，魏晋风度、六朝风流等概括语常用来说明这一时期文学与美学的独特魅力。这些都是研究两晋文学的主要路径。本书沿此路径，仍以两晋文士为题，以这一文学创作主体为重点来分析两晋文学，也是继承传统文学研究的主要思路与方法。但是在选取研究角度时有所创新，本书希望通过“人生趣味”的角度来重新探究两晋的文学世界。

一、趣味与人生趣味

“趣味”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是在西方美学进入中国后才形成的,有着特定的内容与蕴涵。但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与文学中,“趣”与“味”这两个范畴却早已存在,它们与本书所说的趣味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一范畴。在西方美学中,趣味也是由与味觉、食物相关的内涵而隐喻成为对艺术美的感知概念。伏尔泰在《哲学词典》“趣味”条中解释说:“趣味,也就是味觉、辨别食物特性的天赋,在我们所知道的各种语言中都产生了隐喻,即用‘趣味’一词来表示对各门艺术中的美的丑的感知力;艺术趣味就像舌头和上颚一样能迅速做出可以预告思考的选择,对好的相当敏感和喜好,对坏的则难以容忍。”^①这种感知力是一种感受美的能力,它存在于我们心灵之中,感受美,并获得快乐。谭容培《美与审美的哲学阐释》中总结道:“趣味感受和趣味判断不仅要求颜色的娱目、音响的悦耳,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审美关系和审美对象的和谐、完美境界的追求,以满足审美感觉和审美体验的愉悦和自由,即愉悦的心灵化及自由感的对象化。”^②他指出趣味的享受性有两个特征:愉悦感和精神自由感。趣味的愉悦感中蕴含有人类文化因素和显现人类生命价值的意味,而精神自由感则是对于外界表象之和谐运动的观照和体验中获得的精神自由感的满足^③。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在艺术

① [苏]舍斯塔科夫,著.美学范畴论——系统研究和历史研究尝试,理然,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339。

② 谭容培.美与审美的哲学阐释,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263。以下简称《美与审美的哲学阐释》。

③ 美与审美的哲学阐释,1997:264。

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是为着它们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唤起反应和回响。这样,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①趣味美学,既有情感的愉悦性,又有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即情感体验与审美理解的深度。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引入了西方美学理论并结合中国人的人生、艺术等方面,提出了趣味主义:“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②而趣味与文学又是何种关系呢,梁启超给予了文学最高的评价:“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就社会全体论,各个时代趣味不同。就一个人而论,趣味亦刻刻变化。”^③朱光潜也在他的文学思想中提出趣味的概念。他在《文学的趣味》一文中这样说道:“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得的趣味表现出就是创造。”^④文学作品的评判、欣赏与创造是与趣味紧密相连的。人们把自己在人生中的趣味表现出来,即是创造。文士们把自己在人生中的趣味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便成为文学创作。文士们创作了这些作品,也创造了能欣赏这些作品的趣味,而这种欣赏的趣味是与文

① [德]黑格尔,著,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9.

② 梁启超,著,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7—18. 以下简称《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

③ 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2009:213.

④ 朱光潜,谈文学,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16.

士本身的人生趣味相契合的。

中国文化追求人生趣味与世俗情味,乐天知命,生生不息,逍遥游放,体现出一种生命的体认与过程的享受。在先秦时期的儒道思想之中,人生趣味发源于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古典文化蕴涵。这也对两晋时期士人的人生趣味产生了根源性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是生命体验的本原。“天”与“人”有着紧密的联系,天人互动是生命活动与趣味形成的原因。在儒家思想当中,天人合一是最理想的审美体验,亦是一种生命愉悦。天人相互感应,在汉代,董仲舒将这种生命体验论述得十分详细。他将人的情志与天相对应,认为“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①。“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②人们在与天的交感之中获得生命的体验与愉悦,这也是儒家人生趣味的重要部分,即《文心雕龙·物色》提出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而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儒家追求仁与礼,并以圣人作为人格的理想,以君子作为人格的典范。在儒家思想中,“孔颜乐处”是他们人生的旨归。平日饮食是粗茶淡饭清水,睡觉时弯着手肘作枕头,乐就在这种简单的生活之中^③。孔子还称赞颜回的“箪食瓢饮”^④,他们追求仁义之道,却不在意物质生活的贵贱。此种精神愉悦使得他们的人生拥有最高的价值,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也是儒家人生趣味的核心。孔子是一个十分重趣的人,林语堂在《中国哲人的智慧》中说:“事实上,在孔子的所言所行上有好多趣事呢。孔子过的日子里那充实的快乐,完全是合乎人性,合乎人的感情,完全充满艺

①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335。以下简称《春秋繁露义证》。

② 春秋繁露义证,1992,318—319。

③ 《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④ 《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术的高雅。因为孔子具有深厚的情感,锐敏的感性,高度的优美。”^①孔子提出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便是他在人生体验中获得生命精神自由的过程。在孔子这里,音乐、诗文等都是高雅的趣味,这也进一步影响到了后世文人的的人生趣味。

道家的人生趣味是超出人世的,他们善于在宇宙自然中进行生命的体验并获得快乐。这便是庄子提出的天乐:“与人乐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天乐所获得的审美愉悦是建立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的基础之上的,而这愉悦是由何种体验而得来的呢?《庄子·至乐》中认为富贵寿善是天下所尊崇的,而快乐的标准是身体健康、生活安适,有丰盛美味的食物和华贵漂亮的服饰可供享受,又可以欣赏曼妙轻歌、裙带飘舞,然而失去这些以后,一切痛苦便随之而来,这正是对于形体感官享受的过于执着的结果。因此《至乐》篇对此人间快乐逐一否定:“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随后指出“无为”才是至乐,“至乐无乐,至誉无誉”。而与天地相交通的生命体验,便是“遗物离人而立于独”,“游心于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庄子·田子方》)。庄子要求摒弃人乐,“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庄子·天道》),与天相和,达于天乐,这也就是“至乐”,是一种极美的生命愉悦。其中也蕴育了后世士人的高情远趣,特别对两晋时期的玄学名士的人生趣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学与人生哲学紧密结合,仰观俯察,与道周始,赋予生命以浓烈的情趣,这也是儒家与道家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两汉时代以礼抑情,然而汉代依然充满着生活的趣味并影响到文艺形态。汉末魏晋,随着人性的觉悟、

^① 林语堂,《中国哲人的智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5,19.

经学的衰落、士族地位的提高、士族势力与皇权的并驾齐驱，士人主体逐渐突显，对于生活之情欲以及生活趣味的享受成为时流。

魏晋时期即兴起了有关人生趣味的探讨。名士们的趣味涵盖了文学、音乐、书法、绘画各个方面。一些名士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怀有各种小癖好，如杜预喜欢《左传》，和峤爱钱，王济喜欢马，王羲之爱鹅，张湛种植松柏、善养鸬鹚，支道林喜欢放鹤、养马，这些都显示出土人们独特的人生趣味。而这种人生趣味如何分得高下来？《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两个名士——祖约与阮孚的故事。祖约喜欢钱，阮孚喜欢屐，都是一种嗜好之累。有人去拜访祖约，见他正在查看自己的财务，客人到了以后，没来得及收拾完，便将剩下的两个小竹箱藏在身后，神情中略有不安。而有人去拜访阮孚，见他正在吹火为心爱的木屐打蜡，阮孚一副闲适舒畅的神色，兀自感叹道：“还不知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呢！”阮孚的木屐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小的嗜好，而是与人生联系在一起。在天地永恒、人生无常的大背景之下，阮孚一方面对当下人生进行感叹，对生命的短暂惋惜，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痛苦转移到木屐之上，进行精神的超越和理想人格的构建，在闲适超脱的林下风致盛行的当时，这自然是要为世人所拍手称赞的。这二人趣味的高低便由此分出。

两晋时期《兰亭集序》中揭橥了晋人的生活趣味与文学精神的统一，《世说新语》记载士人的趣味与文学轶事。趣味在魏晋时代是联结士人生命意识与生活方式的纽带，其中名士的生活趣味与文艺哲思也体现了中古时代人生与文艺的统一。魏晋时代，对于人生趣味与整个人生意义、价值的讨论与争议，成为人生解放与情欲释放的前提。在此基础之上，趣味得到认同与肯定。魏正始时代的两次大讨论，如何晏与王弼论圣人有无情性论，特别是稍后的嵇康与向秀争辩养生论，涉及趣味的本体，人生究竟如何对待生活趣味，等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生活旨趣论，以及《晋书》本传中称之

为“高情远趣，率然玄远”^①，标志着魏晋人生趣味的自觉形成与升华，影响到生活与文学的方方面面。

《世说新语》的接受与传播正是后世士人对于两晋士族文人的人生趣味与文学的赏接。鲁迅称《世说新语》是名士的教科书，冯友兰称其为名士的“风流宝鉴”。正是因为两晋名士的人生趣味创造了名士风流，留下了一部《世说新语》，且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记录魏晋风流的笔记小品。它使得看似平淡无奇的小事，经过趣味化，形成了文学轶事，成为两晋人生趣味与文学交融一体的经典。至今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这部笔记，欣赏栩栩如生的魏晋风流与诗文形象。六朝时的志人与志怪小说层出不穷，形成中国古代小说史的两大亮点，盖源于士人群体的这种审美口味与趣尚。

两晋人生趣味与魏晋风度之概念，既有一致的地方，亦有很大的不同之处。魏晋风度，也称魏晋风流，是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高度统一，乃魏晋名士的文化身份。刘跃进在《兰亭雅集与魏晋风度》中指出：“魏晋风度，即魏晋时期名士的风情气度，或者径直称作名士风度。这种风气，始于东汉，盛于魏晋，终结于南朝初年。”他还提出魏晋风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德与才，高门与寒门的较量；二曰药与酒，竹林七贤的选择；三曰佛与道，东晋名士的追求。^② 卫绍生《“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所谓魏晋名士风流，与魏晋风度是一个大体相同的概念，包括了谈玄清议、无所事事、饮酒和发牢骚。如果再加上风流自赏和服食养生，就是完整的魏晋风度了。不论是崇尚自然、喜好老庄，还是率性任诞、风流自赏，不论谈玄清议、寄情物外，还是性喜饮酒、不务世事，也不论超然尘世、心慕隐逸，还是服食养生、追慕仙道，都反映出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其不可

① [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1374。以下简称《晋书》。

② 刘跃进，兰亭雅集与魏晋风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10。